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

——兼论国家信用的运用之道

吴方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许 毅 主编

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

——兼论国家信用的运用之道

吴方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兼论国家信用的运用之道 / 吴方伟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问题研究丛书 / 许毅主编)
ISBN 978 - 7 - 5058 - 6852 - 6

I. 论… II. 吴… III. ①资本 - 社会化 - 研究②国家
信用 - 研究 IV. F032. 1 F810.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7879 号

序

许 毅

为吴方伟博士的新著《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作序是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事情。作为他的导师，我不仅见证和参与了这本触及了若干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著作的重要观点的形成，也在这一过程中再次感受到马克思“过渡理论”和“利用资本理论”的光芒和力量，我认为，本书的一些观点和研究成果涉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实现对资本的利用，促进资本的扬弃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原始社会后期因为有了剩余但又不足才产生了阶级差别，因此只有真正实现“三个大大”（生产力大大发展，社会产品大大涌现，社会成员精神文明水准大大提高），这种差别才有可能消亡（这与

资本、货币、国家的消亡是同一过程)，这需要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完成，不可能靠政权更迭或行政命令来完成。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革命传到中国来的，但其多少已经过苏俄及斯大林的修正或诠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并没有作深究，而是满足于概念化、教条式的理解，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理论误区，这就是忽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对过渡的理解狭窄化和教条化，对过渡路径不能根据具体时间地点条件而进行选择。在错误的社会主义观的指导下，苏联也好，中国也好，都办了许多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事情。20 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了无情的失败，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疑虑：马克思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小平同志当时也曾深刻地反思：“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① 他还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老祖宗”是不能丢的，但“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②。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渐入佳境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打开马克思的原著梳理其思想脉络时会发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恰好都印证了马克思的正确。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9 页。

在马克思身上，科学家和革命家两种身份高度统一，不可以对其作任何的割裂，否则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作为科学家，马克思着力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规律；作为革命家，他强调和尊重人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能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无产阶级只有顺应和自觉应用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作为“自为阶级”的积极作用，并最终解放自己。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特别提醒读者：“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参与了当时的革命实践后，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是对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趋势和社会变革的时点认识的深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纠正了他和恩格斯在参加19世纪中期欧洲革命时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虽然马克思早有警告，但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办了不少试图“用法令取消”资本的事情以及其他一些超越历史阶段的事情，结果虽然一度辉煌，但终究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挫折。所有追随马克思主义的人，

几乎都认为自己是穷人，但如何从穷人变为富人，如何消灭人与人的社会差别，并非只是将剥削阶级打倒这样一件事，没有物质条件的极大发展，这些都只能属于空想。

那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而能动地发挥自己在历史舞台上的作用呢？从马克思那里我们能直接得到以下两点：

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过渡阶段”的历史任务与前进方向，并在其中坚定不移地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革命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同义语。在旧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的过程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过渡是不可超越的，其中政治上的过渡，也就是要求无产阶级能动地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对旧的束缚生产力的制度方法不断改革，这便是所谓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任务或前进方向是最终消灭或改变“四个一切”，即“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由于阶级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阶级差别的缩小最终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或者说过渡阶段的任务的实现，最终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这对从农耕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极具针对性）。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社会历史阶段及其任务的认知错位，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向未来社会的“过渡”，而这里的“革命”不仅包含着政权的取得，同时包含着对一切阻

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分配关系、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观念的不断变革。在马克思看来，过渡是无处不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都存在过渡的需要，但经济上的过渡是主线和基础，而政治上的过渡则是其保证。这一过渡的结束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开始，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属于过渡的早期阶段。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把未来社会才有可能做的事要求在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内完成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基础性理论成因。

第二，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资本”的历史作用及其扬弃过程，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作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马克思对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创造世界市场”的作用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在揭示资本最终必然消亡的历史规律的同时，也发现资本消亡的过程可以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因而提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由人自觉地“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的设想，其思想脉络可以这样归纳：只要资本还能够允许生产力发展，还未构成自己发展趋势的最大限制，在此阶段，资本就不应被消灭；资本本身的社会化发展也在扬弃自己，葬送资本的必定是资本本身，资本消亡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人对资本并非无所作为，人的能动性十分重要，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人将从资本的奴隶变为利用和驾驭资本的主体，正是通过人的努力，资本消亡才能最终实现。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提出了政治上的过渡问题，还提出了经济上的过渡问题，因为他已经发现了资本社会化的二重作用：一方面，资本的社会化是对“私人资本”的否定，从而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的社会化扩大并加剧了资本与

生产力的矛盾，为资本的自我否定即资本扬弃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股份制会成为“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沿着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将“过渡理论”与“利用资本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在“过渡阶段”，人们有可能第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被资本奴役的地位而成为资本的使用者和驾驭者，因此发展和利用资本、同时促进资本扬弃也就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留给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课题。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但对于资本的认识是保守的，他们认为资本是永恒的，人只能是资本的奴仆。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无产阶级则相信，资本是可利用、同时可被不断扬弃而最终归于消亡的，在过渡阶段，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使资本为我所用，并逐步推进资本的扬弃。

马克思去世后的100多年里，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资本社会化进程加速，资本扬弃又有新的进展，但这种资本社会化和资本扬弃仍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率先登上了上层建筑舞台，开始能动地推动社会变革，但仍处于“过渡阶段”并在探索过渡路径，马克思当年的基本判断和理论依然正确。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在不断的实践中，结合现实社会活生生的情况不断获得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所在。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也需要有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这与实践的关系很大，在坚持正确的理论和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实际行

动纲领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在实践中发现了其原来对过渡阶段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他不仅试图纠正自己及俄共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看法”，而且在实践中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遗憾的是历史未能给予这些设想在苏联进行实践的机会。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把机会给了中国，从小平同志的反思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将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革命，已逐步摆脱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错误认识的困扰，其实践不断回归马克思“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党内对“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关系的认识、对现阶段利用资本的认识等都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利用资本的探索已经一步步走向深入，并已成为改革开放隐含着的一条逻辑主线，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无可辩驳地反复印证着资本在促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应该说，现在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就目前而言，在理解马克思的过渡理论和利用资本的思想实质，并一脉相承地加以发展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弱。如何把握过渡阶段的任务和历史跨度？如何认识资本的两面性？为什么要“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利用资本与消灭资本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达到辩证统一？利用资本主要是利用什么样的资本，如何利用？这些理论问题说不清楚，我们的工作就会缺乏政治远见和经济手段，我们就难以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和谐过渡。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姓资姓社”的理论争论不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搞的究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怀疑亦有之，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关于改革方

向的不同主张，在这些论争中，大家都把马克思抬出来了，但都存在对马克思的过渡理论和利用资本学说缺乏理解的问题。也有些人是在并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情况下批评马克思，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实践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资本和发展社会化资本等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要求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多一些辩证法。显然，当我们在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进行深入的研究，使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长期存在，不仅形形色色的“左”的或“右”的东西会伺机抬头，而且发展的思路也可能会受到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潜力有可能不能被充分发挥出来。

本书作者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多年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他对社会化资本理论研究的动因来自于实际工作。作者和我有着20年的师生之谊，近年来，他多次和我讨论国家信用的使用和上市公司股改涉及的一些深层问题，例如，虽然近年来国家信用得到了使用，但如何大胆而科学地发挥国家信用应有作用的问题还未解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虽然最终得以推进，但关于这类企业“姓资姓社”的困惑并未得以根本解决。联系到近年来社会上关于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如何走的争论，他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命运和作用进行研究，只有对这一基础性问题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前瞻性探索，我们的思想才会得到进一步的解放，才会少一些形而上学，多一些辩证法，现实中的政

策选择也才可以获得更多、更厚的理论支持，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才能进一步增强，对他的这一想法我完全赞同。

《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的主旨是想阐述这样一个观点：在过渡阶段，社会化资本的发展和科学合理的运用是社会主义国家借以推进“三个大大”的实现和三大差别的缩小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政治上的过渡与经济上的过渡和谐匹配的重要手段，是实践马克思“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思想的重要手段——这样一种观点的形成完全基于马克思的过渡理论和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思想。

众所周知，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纽带，一方面又与劳动对立，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限制作用。资本的这种内在矛盾运动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必然使之产生某种变化。马克思发现，在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社会化趋势必然出现，这种资本的社会化使股份公司“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这里已经发生了资本的扬弃，资本的私人性质和与劳动的对立得到一定程度的扬弃，这是资本的某种进步，因而其中包含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在资本社会化的一定发展阶段上，通过人的努力，“积极地扬弃”可更大程度地扬弃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资本的消灭实际上是一个消亡的过程。资本的彻底扬弃也就意味着资本的消亡。正是基于资本两面性和资本扬弃理论，我们确信资本既要为我所用，又要消亡的原理。

但是，私人资本联合形成的股份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虽然进行了资本扬弃，但其资本扬弃的程度还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内。虽然各类资本以及资本社会化的发展都是我们要鼓励的，因为它们是“利用资本”的基础性条件，但仅靠资本社会化还不能解决三大差别的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化资本在先进的上层建筑的作用下才有可能作为实现和谐过渡并最终使资本彻底扬弃的重要手段。当然这对我们的上层建筑、特别是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了“社会化资本”的概念，是一个破题之作，也是一项体现辩证思维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股份公司仅仅依靠私人资本的联合已不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其他成员拥有了相当的积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投入到企业的职能资本。所谓直接转化，主要指社会公众参股受先进上层建筑引导和社会公众监督的上市公司；所谓间接转化，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社会用国有资本利润和以国家信用方式集中资金进行的投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性基金、投资基金、保险资金和信托资金等在上层建筑引导下进行的投资。这样，在先进的上层建筑的引导下，一种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度更高、使用和分配更加合理，从而资本扬弃程度更高的资本，也即所谓社会化资本便呼之欲出。显然，资本社会化和社会化资本不是同义反复，而是相互区别但又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本社会化和信用制度的发展是社会化资本形成的基础性条件。

社会化资本是资本的一次“羽化”——一种高层次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个人“所有”的资本转化为社会

“所用”的资本的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在这种转换和扬弃中，人的能动性开始发挥，这种社会化资本在保留资本增殖的资本特性之外，在其形成的社会化程度上、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程度上、资本增值部分分配的合理化程度等方面已经或极有可能实现飞跃，在使用时能够较多接受先进的上层建筑的主动引导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化资本有可能承载先进的上层建筑的意图和社会使命、社会责任，使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幅度内，使劳动者的收入能随生产的增长而增长，不致造成两极分化；社会化资本也可能被用来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同时社会化资本也可用来对其他资本起制导作用。

从个人资本到资本社会化再到社会化资本，既是资本自身的一个演进，同时也体现着人与资本关系的变化。马克思资本理论表明，资本是存在扬弃的可能性的，这一发现是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无产阶级在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积极地推进资本扬弃，最终实现资本消亡，从而用和平的方法实现过渡的重要思想武器。在社会化资本吸引其他资本共同运作时，必然带动其他资本的扬弃，正是在社会化资本本身的发展及其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资本实现着自己的扬弃，或者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资本与消灭资本会达到辩证的统一，当然，在这样的资本积极扬弃的过程中，上层建筑的作用的恰当发挥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社会化资本理论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最终建立和完善起来，那么，我们对过渡阶段的许多重大问题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比如，过去一些人对“最高纲领”的可实

现性存有疑虑，他们对“最低纲领”十分认同，因而承认资本的利用价值，但他们不敢想象如何消灭资本，甚至不相信资本最终会趋于消亡，这或多或少地成为某些人对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产生动摇的原因。社会化资本理论的建立有望帮助这一部分人转变观念，增强对“最高纲领”的信念，因为社会化资本越是得到充分利用，越是得到充分发展，不仅“最低纲领”的目标越是容易实现，而且通过资本扬弃最终实现“最高纲领”的目标也就越不是遥不可及的了。在社会化资本理论与实践的支持下，“最高纲领”的可实现性实实在在地进一步增强。同样社会化资本理论对纠正另一些人的错误认识也会有帮助，这些人把“最高纲领”当成当今时代就可以推进的目标，他们针对目前一些地区和人群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还存在剥削的情况，主张限制资本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化资本理论也有助于使这部分人改变认识：在过渡阶段，缩小贫富差距既不能靠限制资本的发展，也不能仅靠行政手段，还须依靠社会化资本发展带动其他资本的发展、最终带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以及分配关系的合理化。

总之，“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应被割裂的，社会化资本的发展利用恰好可以成为我们连接“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重要途径，也可成为我们在“政治上的过渡阶段”发挥上层建筑的能动性，主动地顺应和驾驭规律，推进“经济上的过渡”进程，实现“和谐过渡”的重要举措。至于对上市公司及其股权分置改革的整个看法，在社会化资本理论建立形成后也会更新，不管国家是否控股，只要是上市公司，并且在上层建筑的有效规范和促进下，资本职能与资本所

有权能够实现较高的分离，分配能够达到一定的合理化程度，能够承载上层建筑的某些意图和一定的社会使命、社会责任，它就属于社会化资本的范畴。因此证券市场如果有先进的上层建筑的监管理念和政策的引导，就会成为社会化资本形成发展的前哨阵地。事实上，社会化资本的概念一旦提出，就有很多文章要作，例如单是上市公司如何成为社会化资本载体的问题就可以写一本专著。

《论社会化资本的利用》还有一个副标题——“兼论国家信用的运用之道”，作者选择将国家信用的运用作为社会化资本理论应用的一个主要案例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国家信用工具的分析研究和观念更新，折射社会化资本理论的指导作用。作为“社会化资本”的破题之作，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说明基本观点，案例分析的方法是可取的。事实上，在社会化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传统的国家信用观念有可能被颠覆。较长时间以来，国家信用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被窄化了，国家信用的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僵化了，似乎只有国家财政有困难须举债平衡预算时，国家信用的使用才应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有了社会化资本的学说后，我们的国家信用观会发生一些改变：国家信用绝不仅仅是一个与弥补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范畴，而是一个动员社会化资本的重要方式，而且，利用国家信用进行社会化资本运作，其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能够较为彻底，对资本增值部分的分配更为合理，从而使这种社会化资本扬弃的程度更大。由于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化资本的主要方式是在信用制度基础上通过国家信用来实现，因此国债资金、政策性银行资金、中央银行在一定限度内可使用的资金等国家可直接掌握的资金，构成了中国社会化资本的

巨大来源，而高储蓄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则使这种情况具备可持续性，因此通过国家信用机制实现和推进社会化资本的科学合理运用必将成为继列宁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关于国家信用提出的一些观点是有建设性的，例如，国家信用是国家集中社会资金形成社会化资本的重要途径，科学合理地运用国家信用是国家在过渡阶段利用国内和国际资本的重要方式，是国家第三大调节资本的手段。作者还对三种形式的国家信用的运用之道作了探索性的设想。关于发行信用，提出了对以外汇储备形式存在的社会化资本的利用设想。对过多的国家外汇储备是“包袱”还是“资源”进行了辩证分析，对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投资取向提出了建议。关于财政信用，提出了国债资金用作社会化资本的投资取向应当是充当“正外部性资本”。作者还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不同的国债观进行了梳理，发现其实在国债资金的使用上各种原本不同的观点殊途同归——国债资金用于非生产性开支是不可持续的，其正确的用途是用作社会化资本。关于政策性银行信用，作者认为政策性银行商业化的改革思路值得商榷，指出“政策性”项目内容随时代变化，不能认为政策性业务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性业务的消亡只是在某些基础设施领域，还有许多领域十分需要政策性银行的进入，从构建社会化资本运作体系来看，政策性银行信用不可或缺，而且应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加强扩大。

应该说，作者对社会化资本的探索性研究和辩证方法的运用是十分可贵的，但社会化资本理论的最终建立还